

书评

经济学家:是偏执还是不被理解?



《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
茅于軾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陆伟飞

关于学术讨论,我十分赞同盛洪的主张:一不要怀疑别人的智力,二不要怀疑别人的动机。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这个主张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不怀疑对方智商,这是对人的起码尊重,这点雅量大家都具备了。但怀疑他人动机,却愈演愈烈。学者发表一个观点,大家先习惯性地判断他的利益倾向、属于哪个利益集团,对号入座,然后才仔细斟酌观点中陈述的事实及其逻辑。经济学家首当其冲,因为这门学科所研究的正是最直接的利益。国内知名一点的经济学家,几乎都被揆骂过。这几年网络舆论空间发达,每个人都能便捷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对学者观点的争论也就更加激烈。

若干年前,经济学界流行的一个观点备受舆论指责: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企业家贿赂官员,获得经商的机会和空间,创造社会财富,惠及普通百姓。这便是经济学所讲的帕累托改进。注意,这里对官员的索贿的权力是认可的,是一个赎买对象。如果碰到清官,那么商人也就没有了经营空间,社会财富就不会增加。经济发展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所以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没有腐败就没有发展,这是逻辑自明的。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采取了价值中立的态度,而大众则对腐败切齿痛恨。在经济学中,利益并无正当不正当之分。前段时间,张维迎因为说改革开放以来官员的利益损失最大,被众多网民解读为替贪官鸣冤叫屈。其实张维迎所说的利益也是中性的,没有为他们叫屈,更没有赞扬的意思,只是客观描述而已。至于张维迎所说的事实真实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了。即使有偏差,我们也不能解读为他在故意歪曲事实。

最近,这股战火向茅于軾。茅老在学界德高望重,很多人没想到他也会深陷信任危机。网络就是这样,否认一切权威,甚至有点永远反对派的意思,这是它的可爱之处。但也有听风就是雨的浮躁。近日,茅于軾出版了文集《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当前社会问题随笔》,他把备受争议的那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放在了第二的位置。老头很倔,只要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就会坚持。就像法官,只对法律负责,不为民意理单。文章讲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要让全国人民都富起来,就必须保护富人(当然是指合法致富的人),如果仍然仇富,已经成为富人的也会返贫,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受穷。可是网民意见不是这么看。现在民生问题那么尖锐,那么多穷人需要被关心,你为什么偏偏去关心富人的处境?这就变成立场问题了。茅老也很清楚提出这个观点的危险性,但他仍然要去碰。

经济学最关心的是效率。只要把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大了,其他什么事情都好办。所以经济学家最反对的就是价格管制。这种措施短期内可以缓解民生,让老百姓不因涨价而降低生活质量。但是被压制的价格所带来的必定是商品短缺。生产者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自然就缺乏增产的动力。长期来看,百姓还是得受苦,而且程度可能更深。但是政策是被民意推动的,而百姓往往看不到全局。

火车票该不该涨价,争论好多年了。文集中,茅老是主张涨价的。每年春节,那么多人排队买票,却并非人人能成行,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因为价格偏低,排队浪费时间,是效率最低的分配方式。不如抬价,直到供需平衡,无人排队,省下时间创造更多财富。铁路方面,也可获得更大收益,并加大建设投入,增加运力,提高服务,让更多的人春节能够回家。但是,铁路目前是垄断部门,舆论普遍怀疑,即使获得了丰厚利润,铁路是否有动力增加供给。这种分析同样也适合于学费涨价。茅老主张提高高校学费,认为现在的低学费导致富人搭穷人的便车。从富人那里收来的学费,一方面可以增加学校经费,提高办学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穷学生设立奖学金。这又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安排。这里暗含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穷人的孩子只有更加努力才能获得奖学金,以便完成学业。读大学不是普遍的福利,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国家没有责任保证不努力的穷孩子也能上大学。不过舆论依然担心,现在的高校制度不能实现上面讲的两个目标。万一钱收多了,却成为贪官的对象,或者被僵化的管理体制消耗,既不能提高办学质量,也无法反馈穷学生,还不如大家公平一点享受低学费。的确,对于这种预算软约束的部门,由于缺乏竞争,他们没有降低成本、增加供给的动力,是不是可以给予完全自主的定价权,还是值得研究的。

敏感的话题还很多——房价、医改、社保、股改等等。这些都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争论就很激烈。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利益分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有人得意,有人失意。目前资产价格上涨船高,先富的人因为掌握资产变得越来越富,这让后富的人心里不服气。同样的努力程度,除非有机会爆发,否则永远也赶不上前面的人。正因为心中有气,一旦触及贫富问题,情绪就会战胜理智,屁股替脑袋发言。资产价格上涨速度,让后富的人心里不服气。同样的努力程度,除非有机会爆发,否则永远也赶不上前面的人。正因为心中有气,一旦触及贫富问题,情绪就会战胜理智,屁股替脑袋发言。资产价格上涨速度,让后富的人心里不服气。同样的努力程度,除非有机会爆发,否则永远也赶不上前面的人。正因为心中有气,一旦触及贫富问题,情绪就会战胜理智,屁股替脑袋发言。

经济自由和社会民主这对矛盾,经济学一直没有处理好。经济自由要求政府尽量少干预,至多担当维持秩序的守夜人角色。但社会民主却要求关心弱势群体,甚至要求财富在成员之间进行双向分配。这对矛盾其实是基于人的双重属性:你是社会的个体,拥有充分自由,只要不违反法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你是国家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既然是共同体就有它的价值目标,作为成员你就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其实很古老,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就生活在共同体之中,只有靠互相帮助才能生存下来。部落、国家、家庭,都是如此。而经济自由则是个体能力强大之后才产生的意识。经济自由度高,表明一个社会充满活力,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但国家的使命显然不仅仅是追求总量上的富足。成熟国家的国策都试图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平衡点。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浮躁

——读《中国人的焦虑》

◎邓海欧

“浮躁”这个词在当今社会是如此地流行。在极端浮躁的心态下,人际交往中,人们重视的更多是结果,过程则被简略为最小值。这似乎是经济社会的应有之道,自然也成为当今社会最盛行的行为方式。这种浮躁不安的心态渐次蔓延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层面。人们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浮躁,又为什么会这样浮躁?

文化学者胡卫泽在他的新书《中国人的焦虑》如是解释:“如果我们分别考察今天的一些职业人的生活轨迹,就会几乎没有例外地发现,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浸泡在经济利益这个大染缸里。他们的每个细胞都浸透了经济的利益,离开了经济利益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他们又像被压在了发条的陀螺,被绑在经济社会的巨大机器上,随着这机器的惯性身不由己地运行着,奔忙着,就在这身不由己的运行中释放着自己的生命能量。如果说他们是经济的动物,真是算不得过分的夸张。”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与胡先生的论述不谋而合,韦伯把现代经济社会称为一部巨大的机器。这部机器以经济利益为根本动力,机器的每个部分都是按照“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要求组合起来,在理性主义的统辖下,井然有序,运作良好,形成现代社会著名的科层制。科层制无疑具有强大的可操作性,当然也会产生巨大的效益。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管理制度、法律规范、经营计算等具体的形式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左右着我们的全部社会行为。问题是,马克思·韦伯所谓的科层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一部大机器的同时,把生活在其中的人变成了一部小机器。人不是机器,也不能成为机器。人是活生生的,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人首先是精神的,其次才是肉体的。黑格尔曾表述过

这样的意思,人穿衣服这件事,首先不是为了御寒,而是为了克服羞耻感的需要。马克思·韦伯承认,科层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把人“非人格化”和“物化”的同时,造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忽略了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命的终极关怀。

被彻底纳入到经济机器和科层制中的人必然会产生强烈的焦虑。经济机器也好,科层制也好,都只不过是理性主义的现代表达。人们早就认识到,理性只能解决人类对客观世界探索中的“是与非”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精神生活中的“对与错”的问题。对与错,就是人类精神生活最核心的价值观问题。人类需要灵魂的家园。正是在这里,《中国人的焦虑》告诉我们:“焦虑是产生于理性而脱离了理性轨道的一种情绪。”

这个定义,与过去所有的心理学家、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看法都不一样。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胡先生坦言在这一点上他走得相当大胆。对于自己设定的挑战书,他选取了一个十分奇特的角度:既有心理学的,也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更多的是从文化学多个角度来审视问题,这也许正是他能够提出如此独特观点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本书中,胡先生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尤其对古希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人类文化的标志和源头作了细致的梳理。对于这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他的归纳是,中国文化是“理性不足,情理有余”。他认为,西方人从骨子里就是充满着焦虑的;而生活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中国人,并不产生明显的焦虑:“中国人——即便是寻常的中国人——的生活,既是一种世俗的生活,也是一种心灵的生活。在这种生活模式的指引下,伦理、道德、情理、精神渗透于中国人的哪怕最寻常、最底层生活的每个细节。”因此,“传统的中国人生活很少焦虑,即便发生焦虑,也较容易获得解决。随着焦虑的解决,中国人的心灵便在较低的物质生活中赢得



《中国人的焦虑》
胡卫泽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宁静、安谧、平衡的生活气氛,在这种生活气氛中领悟到生命本源的意义,寻求到人生价值的最后归宿。”

在胡先生看来,现代中国人的焦虑,是由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传入和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强烈冲击造成的,所以说是“双重的焦虑”。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中国人始终处于被动、不断挑战、不断应对、不断失落、不断失落、不断失落。”

胡先生把自己的探索称为“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是有些意思的,他告诉我,他最终目的是想在重建中国文化上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他谙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尤其对明朝的大学者王阳明非常心仪。但他认为现代中国人不能完全回到传统文化中去。事实上,在这个现代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就是想回到传统文化中去也回不去的。现代人只有做现代事才能真正向前发展,他宁愿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作为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他能够在能够做的还是回到心理学,回到心理治疗学领域。他的“文化突围的尝试”,就是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创立心理治疗的“情理模式”,也就是说,要按照中国人“合情合理”或“通情达理”的方式来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新书过眼

《通向财务自由之路》(原书第2版)

很多人都希望获取战胜股市的秘诀,从此一劳永逸,但是国际交易大师研讨培训公司创办人兼总裁撒普的这本书却说,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交易者还是投资者,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个性和目标的方法,摆正心态,这样才会达到财务自由的境界。撒普一再提醒读者,在寻找获取利润的途径时,必须先问自己:该方法适合你吗?与你的投资目标相吻合吗?符合你的个性吗?你能够忍受它可能造成的亏损甚至接连失败吗?试图从市场中赚钱,首先得设计一个适合自己个性和目标的方法。这本运用了大量的实际案例和模型的书在强调自我挖掘和心理因素的基础上,指导读者如何设立自己的系统(了解自己、准备、设定方案、选择、入市、退市、获利、评估)。同时,本书还介绍了许多被其他投资著作所忽视的内容:预期、头寸规模、目标、大环境、资金管理等等。



(美)范·K·撒普 著
董梅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拆散福利国家》

——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

时至今日,对福利国家的解构和建构始终没有消停。社会保障项目在施加分散的和常常是间接成本的同时,提供了集中性的和直接性的福利,这一点是它们拥有持续不断的政治生命力的重要根源。但相对于等量的收益,选民们更倾向于对等量的损失做出更为激烈的反应。福利国家因此越来越难以维系,促使紧缩政治学的兴起,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都希望通过对项目与制度性紧缩,拆散福利国家的危机。保罗·皮尔逊本书对英、美政府解构福利国家进行了较为独特的研究,作者所要阐明的主题是:紧缩是一项极具特色又困难重重的政治事业,它绝不是对福利国家扩张的简单映照,因为紧缩倡导者必须在福利国家本身已经根本转变了的政治地形上运作。或许,书中的制度主义、政策反馈等分析尤其值得注意。



(英)保罗·皮尔逊 著
舒绍福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12月出版

《复制猫营销101》

如何复制你的财富之路

本书对人生有两个重要提醒:真正的财富=自由,这包括三重含义:远离负债的自由、远离老板的自由、远离压力的自由;从前的成功系统是自由时间“换取”金钱的陷阱,在新的成功系统则是以倍增“杠杆”财富的网络。畅销书作家巴克·哈吉斯的这本曾畅销数百万册的经典作品,从真正的财富概念入手,分析了两种赚钱的方式,指出通向财务自由的真正道路是:创造属于你的自己的杠杆或倍增系统。用哈吉斯的话来说,不是你不能富有,而是你不知道富人为什么比你富有。你也许多身都在模仿一个不能使你富有的系统,而不是模仿一个创造财富的系统。正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会领袖索·希尔所言:“我们整天工作,却睡在草堆里,到死才发现这是个陷阱。”



(美)巴克·哈吉斯 著
赖伟雄 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年2月出版

《付出》

我们可以改变世界
GIVING: How Each of Us Can Change the World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其两任总统任期内,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并成立了克林顿慈善基金会,为全球人民的健康、贫穷、环境和经济问题而奔劳。这本书讲述了他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慈善活动中的亲身经历,还有他所遇到的从资本大亨、技术天才、娱乐名人到最普通的人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世界的故事:无论是比尔·盖茨夫妇、沃伦·巴菲特、奥普拉·温弗瑞、鲁珀特·默多克,还是那位患了骨骼发育不全后遗症、身体中的每一根骨头稍稍受到外力挤压就有可能断裂的布里安娜,或者年仅6岁便开始组织清洁海滩运动的麦肯齐·斯坦顿,都在尽己所能,为世界更美好的明天付出自己的金钱、时间、精力和技能。他们心中坚持着一个共同的信仰:每个生命的价值都是平等的,付出比索取更令人感到满足。



(美)比尔·克林顿 著
于小微 王恩冕 译
中信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赢在华西》
刘世英 冯治著
中信出版社 2008年2月出版

◎吴晓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吴仁宝身份的确认是个悬而未决的争论,这位现年80高龄的老人一面是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江苏省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村支书——所有的这些身份唯

双面吴仁宝 天生企业家

指向一个答案,那便是政治家。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厂长,是董事长与经营者,他领导下的华西集团创立了“华西村”、“仁宝”等品牌,并且在1999年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在现代社会中,只有企业家的脑袋才会思考公司上市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两种完全不兼容的“血型”,却在吴仁宝身上融在了一起,让无数“企业家应远离政治”的忠告破产,也让世人每每产生好奇之心,其中包括美国的《时代周刊》,这家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在2005年用了一期封面文章来解读吴仁宝。不过,对吴仁宝和华西村最全面的解读当然还是来自于国内,比如这本新出版的《赢在华西》。

我10年前就访问过华西村,近年,为写作《激荡三十年》,又通过公开资料详细查阅了吴仁宝和华西村的资料,但阅读这本《赢在华西》,仍然让我多出了几分感触。吴仁宝从

28岁起担任华西村书记,直到48年后宣布退休,期间他让华西村从一个僻静的山村,变成了别墅成片、绿树连荫的世外桃源,2006年全村销售收入是400亿,而同期国家集团刚过百亿产值。在这样的传奇背后,是吴仁宝受到过从毛泽东开始的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都曾为其座上客,也正是这些原因,很多人眼中的吴仁宝更多了些政治光环。

但我更看重的是吴仁宝企业家的一面。因为对于中国公司而言,那种不可复制的、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机遇千年始出一回,或许不具普遍意义,而吴仁宝和华西村所展现出的企业一面,却可令众多企业经营管理者借鉴。

在《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为企业家所画的肖像中,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特质包括:天生的敏感、对金

钱的极致追求、冒险、赌博以及游离于疯狂与理智之间的平衡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讲,吴仁宝是天生的企业家。

那个有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是这样的:1992年3月1日凌晨两点多,刚准备休息的吴仁宝看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报道,他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于是当下召集村干部,下令动用一切资金,大囤生产原材料。此前吴仁宝一直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地向外借款2000万元用于周转,在外人看来几成疯狂之徒。但最后的事实是,利用借来的这笔钱,吴仁宝跟他的华西村狠狠赚了一笔:“华西村当时购进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就因为吴仁宝的一次会议,华西村便赚了1亿元,企业的价值彰显无遗。事实上,对于社会风向的敏感并非吴仁宝一人,联想的柳传志因着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科学养牛的文章而嗅出中国将变之风;而霍英东则是通过观察北京首都机场大道旁裸体画像是

否被撤走而感悟商机的——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企业家有时就是天生的,吴仁宝正好是其中一个。

与天生的敏感相比,后天的克制则是企业家吴仁宝基业常青的根基。在华西村崛起前后,同样具有奇迹般成功的地方还有河南的刘庄和南街村,以及天津的大邱庄,浙江的横店等等。天津的大邱庄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与华西村并称为“北大南华”,它们的发展模式非常相似:以经营企业的思路来治理乡村,依靠发展重工业迅速致富。但是,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发达后骄横一时,最后因与地方政府抗法而落得牢狱之灾;“华西村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就因为吴仁宝的一次会议,华西村便赚了1亿元,企业的价值彰显无遗。事实上,对于社会风向的敏感并非吴仁宝一人,联想的柳传志因着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科学养牛的文章而嗅出中国将变之风;而霍英东则是通过观察北京首都机场大道旁裸体画像是

否被撤走而感悟商机的——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企业家有时就是天生的,吴仁宝正好是其中一个。与天生的敏感相比,后天的克制则是企业家吴仁宝基业常青的根基。在华西村崛起前后,同样具有奇迹般成功的地方还有河南的刘庄和南街村,以及天津的大邱庄,浙江的横店等等。天津的大邱庄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与华西村并称为“北大南华”,它们的发展模式非常相似:以经营企业的思路来治理乡村,依靠发展重工业迅速致富。但是,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发达后骄横一时,最后因与地方政府抗法而落得牢狱之灾;“华西村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就因为吴仁宝的一次会议,华西村便赚了1亿元,企业的价值彰显无遗。事实上,对于社会风向的敏感并非吴仁宝一人,联想的柳传志因着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科学养牛的文章而嗅出中国将变之风;而霍英东则是通过观察北京首都机场大道旁裸体画像是